

教育

管理研究

J

萧宗六 著

JIAOYU GUANLI YANJIU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管理研究

萧宗六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武汉

558141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管理研究/萧宗六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5622-2081-6/G·1010

I. 教… II. 萧… III. 教育管理—文集 IV. G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67189 号

JIAOYU GUANLI YANJIU

教育管理研究

© 萧宗六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 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 董中锋
责任校对: 罗少琳

封面设计: 甘英
督 印: 方汉江

开本: 850×1168 1/32
版次: 2000年1月第1版
印数: 1-4000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63千字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涉及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领导科学等方面的内容，但都与教育管理有关。这些文章，发表于全国各大教育报刊，都是针对教育管理、学校管理中的现实问题，或发表议论，或进行评论，或提出商榷，或点名质疑。特别是对教育方针、校长负责制、非智力因素和素质教育等问题的阐述，在全国教育理论界有较大影响。萧文公开评论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北师大著名教授顾明远、上海师大教授燕国材等人的文章或学术见解，张、顾、燕也就萧文写了商榷文章（附录于书中），对教育理论的探讨起了推动作用。这些文章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对培训教育管理干部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本科生、研究生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富有启发意义。

本书共收论文六十余篇，是从作者二十年来撰写的一百四十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我国由个人撰写的教育管理方面的论文选集，此书是第一本；公开点名评论教育界高层人士的学术见解，此书也是第一本。

自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两所附中工作了29年。起初担任教师、班主任和教研组长，更长的时间是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残酷斗争，从事体力劳动达七年之久。林彪叛逃摔死后，我才得以“解放”，重新当教师、班主任，不久恢复原职。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我由华中师大二附中调校部教育系和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双肩挑”干部，从事教育管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改革开放20年，我出版了几本专著，发表了一百四十多篇论文。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六十多篇文章，就是从中精选的。

二十年来，我的写作欲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什么原因呢？还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后不久，中央准备召开理论务虚会，以澄清重大理论问题的是非，通知各高校写文章。我系接到通知后，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写作组，我担任组长。根据教育战线的情况，我提出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一、1958年提出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予修改；二、中小学领导体制要进行改革，应实行校长负责制。不久，写作组另外两位同志认为，这两个问题太敏感、太冒风险，先后退出。我只好单干。1979年11月，我的两

篇论文完稿：一、《教育方针质疑》，一万余字；二、《中小学领导体制应当改革》，五千余字，寄《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内参”在1980年4月2日和4月10日分别刊出。这两篇文章涉及的内容，的确是极其敏感的，是“禁区”。众所周知，教育方针历来是只能执行，不容许讨论的；中小学由党支部书记说了算，也是不容改变的。1957年有不少同志就是因为“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教育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总方向和总目标，是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贯彻。党的工作重点既然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果仍然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质上是为阶级斗争服务），那是与新时期的总路线不相容的。中小学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内部矛盾重重，管理效率低下，领导体制亟需改革。我作为教育战线的老兵，体会极深，事业心和责任感促使我不能不实话实说。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说的“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是说话算话的。即使有人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文革”期间那样的无情打击，我不是顶过来了吗？我深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已经过去。所以这两篇文章能在《人民日报》“内参”发表，我受到极大鼓舞，激发了我极大的写作热情。我继续深入研究教育方针和校长负责制两大问题，在重要教育报刊上公开发表系列文章。这就是本书第一和第二两部分的内容。

当然，事情并不那么顺利。1981年4月，全国教育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福州举行，我在大会上宣讲了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引起许多代表的惊讶。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本来是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但有人却要组织文章批判我在教育方针问题上的“错误”。当然，这种老一套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的极左做法，是不得人心的。批判搞不起来，只能不了了之！福州会议结束后，我应江西省教育学会和江西师大教育系的邀请，向南昌市教育界同志三百余人作学术报告，谈了在福州会议上的观点，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有人认为，我的报告中有反对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的内容（指主张实行校长负责制），并写信向我校领导反映。当然，这件事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后来，中央印发的重要文件，实际上肯定了我在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见解。例如1985年5月27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等和中等以下各类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纲要》和《教育法》提出的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方针作了重大修改。由此我想到，用极左观点看待一切事物的人，总还是会有有的，但也无碍大局，正如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留给后世的现在听起来仍然很洪亮的录音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学术研究上，我历来观点鲜明，服从真理，不随声附和。这大概是我的个性。例如对以营利为目的的“贵族学校”，我很反感，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我国教育科学的落后局面，我表示忧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否定传统教育，我不以为然；对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马列语录来作为理论根据，我认为是一种不良的研究倾向；对十分流行的“培养非智力因素”的说法，我认为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对风行全国的“素质教育”的口号，我提出质疑，认为不如提人人皆知的“全面发展教育”为好；对高等学校也把“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高喊“高等学校也要转轨”、“高等学校的德育也要转轨”，认为是不考虑高等学校的特点和任务，随意套用口号，等等。这些评论性的、经过独立思考写出来的文章，成

了本书第三和第四两部分的主要内容。

本书涉及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领导科学等方面的内容，但都与教育管理有关。这些文章，发表于全国各大教育报刊，都是针对教育管理、学校管理中的现实问题，或发表议论，或抒发评论，或提出商榷，或点名质疑。特别是对教育方针、校长负责制、非智力因素和素质教育等问题的阐述，在全国教育理论界有较大影响。有的文章公开评论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北师大教授顾明远、上海师大教授燕国材诸位先生的学术见解，张、顾、燕也写了与我商榷的文章，对教育理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论者指出：专家学者在学术问题上公开评论政府高级官员的学术见解，政府高级官员也以平等的态度写商榷文章，在建国后尚少先例，希望这种民主讨论的风气，能够坚持和发扬。我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对于学术问题的争鸣，政府官员只能以平等的态度发表意见或参与讨论，不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本书共分四部分。一、教育方针的研究与争鸣；二、校长负责制的探索；三、学校管理与改革；四、教育科学研究与评论。第三、四两部分占的分量最重。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作个别文字订正外，均按原件付印，以保持原貌。各部分的篇目，根据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部分文章在篇末写了“附记”，供读者了解当时的写作背景。

本书目录和部分内容，曾征询过一些同行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本书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培训教育管理干部、学校管理干部有现实指导意义，对师范院校教育系的本科生、研究生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富有启发意义。这也许是溢美之辞，但愿它能在这些方面发挥一点作用。

本书能顺利出版，应该感谢我校领导的亲切关怀，感谢华中师大出版社的积极支持。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在征得张承先、顾明远、燕国材诸位先生同意后，本书附录了他们同我商榷的文章。我诚挚地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萧宗六

1999年元旦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第一部分 教育方针的研究与争鸣

- 教育方针质疑..... 3
- 试论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 19
- 新时期教育方针的再探讨 27
- 简论教育功能、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的表述 34
- 也谈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兼评张承先、顾明远等同志的
教育方针表述方案 42
- 怎样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56
- 教育管理人员要认真学习新时期的教育方针 63
- [附录] 关于新时期教育方针的表述——与萧宗六同志商榷
..... 张承先 70
- [附录]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的重要内容——与萧宗六同志商榷 顾明远 75

第二部分 校长负责制探索

- 中小学领导体制应当改革 85
- 学校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 92
- 谈谈校长的产生..... 101
- 实行校长负责制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103
- 校长负责制试行中的若干问题..... 106
- 学校党政分开认识谈..... 111
- 中小学应继续实行校长负责制——建国后中小学管理体制改

革的回顾与思考·····	116
论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120
论中小学的德育工作体制·····	123
关于校长负责制的几点思考·····	126
中小学应普遍推行校长负责制·····	136

第三部分 学校管理与改革

学校管理学是一门重要的教育科学·····	141
学一点学校管理学·····	145
校风与学校管理·····	149
校长怎样管好教学工作·····	153
知人善任——谈人事管理·····	157
学校的民主管理·····	162
学校的科学管理·····	167
高校学生管理的宽与严·····	174
学校管理要讲究规范化——从一张处分学生的“大字报”谈起·····	177
“减负”要从提高认识入手·····	180
《小学管理规程》的法律效力·····	185
《小学管理规程》与小学校长·····	188
先办好大学，还是先办好小学——《小学管理规程》漫谈之三·····	191
论校长的威信·····	194
论领导者的素质·····	197
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是治校之本·····	205
正人必先正己——论校长的自我管理·····	215
谈谈校园环境管理·····	221
谈谈“校园文化”建设·····	227

学校管理常用的方法·····	233
学校管理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礼记·····	240
学校管理改革纵横谈·····	252
“贵族学校”引发的思考·····	256
敢问“晓庄贵族学校”的办学思想·····	259
私立中小学高收费也应遏制·····	261
办好普通教育的重要规律——湖北省普通教育三十年的回顾 ·····	263
中小学管理研究二十年·····	284

第四部分 教育科学研究与评论

怎样改变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落后局面——在《中国社会 科学》杂志社召开的“教育科学的现状与发展”座谈 会上的发言·····	301
教学原则要体现我国的特色·····	310
论学校管理学的教材建设问题·····	324
试论教育行政学的学科体系·····	334
试析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兼评几种流行的说法·····	340
评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倾向·····	344
教育管理学的重建与发展·····	351
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环境与方法·····	363
简论陶行知的办学思想——纪念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	367
“培养非智力因素”的说法不科学·····	377
[附录] 论“培养非智力因素”说法的科学性····· 燕国材	383
开展学术讨论是繁荣教育科学的重要方法——兼答燕 国材同志·····	393
“素质教育”的说法值得商榷·····	405

还是提“全面发展教育”为好·····	409
推进素质教育应澄清的几个认识问题·····	417
高等学校何必套用“素质教育”·····	424
“三个面向”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深远意义——回忆十三年 前教育界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	428
我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教育思想简论·····	433
为师须有“道”——与教师谈谈教育科学·····	438
“无为而治”不可取·····	442
后记·····	446

第一部分

教育方针的研究与争鸣

教育方针质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教育战线过去有没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需要改变和调整呢？本文仅就教育方针谈一些看法。1958年以来，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什么呢？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这个方针。第二种说法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谈到的，许多同志都引用这段话作为党的教育方针。但随后有人解释：这不是教育方针，这是教育方针要达到的目的，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从文字上看，也确有道理。其中的“使”字，作了回答。于是出现了第三种说法，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加上“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那段话。这三种说法，不仅见之于报端，而且经常出之于高级负责同志之口。一个工作方针，三种说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混乱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教育方针，也应该加以澄清，且不说是否

需要调整或改变。

上述三种说法，其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必须”）是国家用正式文件规定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包含的内容是什么？二十多年来，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今后是否适用？有必要用多年来的实践加以检验。而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两个必须”产生的历史背景。

“两个必须”产生的历史背景

“两个必须”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这个方针。“指示”的第二部分在谈了建国九年来教育工作的成绩以后，对工作中的错误是这样写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犯过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九年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经验，并且使我们有可能更加明确地和系统地提出党和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针……”接着第三部分的开头就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很明显，这个方针是在总结建国九年来教育工作存在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等“错误”提出来的。后来有些人不断指责教育工作“三脱离”，就是从这里来的。

1958年以前的九年，我国教育工作是不是犯了两个“脱离”、两个“忽视”的错误呢？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精神确定